

著名戏剧家曹禺



《雷雨》的前世今生

文\本刊特约撰稿 乔宗玉

2010年，中国现代剧坛最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先生(1910—1996)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各地剧团纷纷举行了纪念曹禺百年的演出活动。北京人艺推出《日出》、《雷雨》、《北京人》、《原野》四台大戏，苏州评弹《雷雨》、上海沪剧院《雷雨》、《日出》、《原野》相继晋京上演，引起不小的轰动。

今年2月24日至27日，著名导演王延松带着自己全新解读的《雷雨》首次登陆国家大剧院，该版本自2007年在上海首演以来获得了众多认可，曹禺先生的女儿，著名剧作家万方认为此版《雷雨》是最忠实于曹禺先生原著，最原汁原味的版本。

一部作品在舞台上演了50多年，还成为中国在海内外影响较大的一出话剧，至今仍在吸引人们以各自的角度不断诠释着，话剧《雷雨》就有这样的魅力。



《雷雨》是曹禺的话剧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典范之作。



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雷雨》

《雷雨》的前世今生

《雷雨》于1935年诞生，首演于日本东京，接着，天津、上海、南京相继上演。1947年，《雷雨》在台北演出。不仅中国人爱演《雷雨》，看《雷雨》，《雷雨》还被翻译为日文、英文、朝鲜文、越南文等，登上朝鲜、越南、新加坡、俄罗斯的舞台，是中国在海内外影响较大的一出话剧。

完整的《雷雨》剧本，序幕、尾声处，洋溢着神秘的基督教气氛，远处教堂合唱弥撒声、大风琴声，透着救赎、忏悔的气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在左倾思潮影响下，《雷雨》的序幕、尾声自然被割除在舞台之上，同时，周朴园和鲁妈这对原本有些类似《红楼梦》宝玉与袭人关系的情侣之间的恩怨转变为阶级斗争。

而今，比较公认的属于样板的《雷雨》当属北京人艺夏淳于1954年导演的版本，主演郑榕、朱琳、苏民、胡宗温等。今天看该剧的录影带，演员的某些表演方式有些过于夸张、过于拿腔拿调，甚至是概念化，但郑榕塑造的“周朴园”、朱琳塑造的“鲁妈”却是深入人心的。以至于近年，我在首都剧场见到轮椅上的郑榕老先生，激动不已，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经典“周朴园”，是那个说话铿锵有力、专横霸道的封建家长“周朴园”。

1993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王晓鹰导演“新版”《雷雨》，删除了鲁大海这个人物，使剧情更加凝练集中，得到曹禺认可。2003年，23位中国戏剧“梅花奖”演员共同演出《雷雨》(总导演：徐晓钟)，这次演出恢复序幕、尾声，濮存昕、肖雄等“梅花奖”得主济济一堂，令《雷雨》星光闪耀。

今岁，上海戏剧学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国家大剧院推出全新解读版《雷雨》(导演：王延松)，这个版本和“梅花版”《雷雨》一样，也保留了原著序幕、尾声部分，强调宗教情怀。王延松对《雷雨》的解读是：“《雷雨》，是一个男人和先后两个女人情爱故事的循环再现……因此，就会有一个新的主题线索：人为什么要这样彼此爱着？”显而易见，这一版《雷雨》将主人公们的爱情线索作为主导，呈现整个故事，与我们这个小时代的趣味不谋而合。

曹禺剧作将“美”与“善”完美结合

百年回望，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



王延松导演的新版话剧《雷雨》剧照

展为富强、民主、独立的国家，曹禺的一生历经中国近现代史各种政治风云，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国共战争、新中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说，曹禺是幸运的，因为他见证了中国最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故而他的人生与他的作品有着别样的厚重感。

1935年，曹禺先生创作《雷雨》、《日出》，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成熟(引自《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随后，《原野》问世。《北京人》写毕，曹禺先生的编剧生涯达到顶峰，时年不过30岁。由此可见，曹禺先生是一位非常早慧敏感的人，这与他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幼年丧母等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曹禺的《雷雨》正写于在清华园与日后第一任妻子、大家闺秀郑秀热恋之时，浓烈的爱情，无疑是创作的灵感源泉。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中国人文思潮活跃，剧坛更涌现出无数名家名作，像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田汉的《秋声赋》、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宋之的的《雾重庆》等等，然，当今依旧在中国剧场上演的，仅有老舍与曹禺两人的剧作。老舍的戏，得益于首都北京的先天环境，京腔京韵，富有浓郁的燕赵民风，同时，其《茶馆》又得焦菊隐导演及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老一辈“北京人艺”演员精彩的二度创作，成为中国话剧演出的不朽经典。很难说，《茶馆》拿给南方的剧团演出，也能散发出如“北京人艺”版一般的魅力，但《雷雨》、《日出》、《原野》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江南江北，老少皆宜。

曹禺的戏剧能够在舞台上存活半个多世纪，足以证明它的不凡之处。我在青年时代，也曾经“反叛”过，不认同曹禺的独特性，认为他的剧作模仿痕迹太重，易卜生的《群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拉辛的《费德尔》、奥尼尔的《琼斯皇》、契诃夫的《三姐妹》……都在曹禺剧作中打下明显的烙印。而今，在戏剧界浸淫十余年后，我终于发现，曹禺先生的戏尽管有着鲜明西方经典戏剧名著痕迹，却洋溢着中国式的情怀，曹禺以西方的方式说着中国的人情世故，使中国的话剧呈现出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深刻的反思性。

我们知道，中国早期话剧，选择“易卜生主义”，是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进而忽视了话剧这个舶来品的艺术本体美。尽管有“爱美剧运动”等数次企图提升话剧审美特性的运动，

但均告以失败。在舞台美学的体现上，戏曲已经登峰造极，而传统戏大部分剧目，过于娱乐性，迎合中国大众的乐感文化，显然不合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宜。话剧引入中国，当时的文化人看重的更是它的醒世作用。曹禺的戏，无疑是在审美性和思想性上结合得最为出色的。

《雷雨》遵从“三一律”，高难度的“锁闭式”结构，戏剧性无处不在，悬念、突转等元素运用自如，结构紧凑、机巧，一环扣一环，时刻不让观众松懈。尽管《雷雨》剧情涉及“乱伦”这一古希腊悲剧常见主题，但中国青年观众仍然愿意看，也愿意演，是因为剧本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表达他们的心声。从另一方面来说，曹禺从童年起便跟着继母到处看戏，深谙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喜看传奇，“乱伦”在一定程度上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曹禺剧作具有深刻的批判性

在曹禺同时代的剧作家中，夏衍、田汉、宋之的皆擅长写知识分子，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田汉的《秋声赋》、宋之的的《雾重庆》等，都可谓个中翘楚，但现今，这批作品几乎很少搬上舞台，曹禺的《北京人》却屡演不衰。其间的原因何在呢？我个人以为，曹禺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对中国传统思维最具有批判性的一位编剧，不破不立，正因为长期受到封建家庭的压制，所以反抗性更强。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江泰”具有入木三分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征：小有才华，却在家庭中受到来自于传统的“父权”、“妻权”的压制，变得游手好闲，孱弱抑郁……曹禺按照俄罗斯文学“多余的人”塑造出带有中国特征的“多余的人”形象，因而人物具有更多的现实批判性，富于西方油画立体感，而不简单是一个中国国画式的平面描画。

当今中国剧坛，模仿老舍风格的剧作层出不穷，像过士行的《厕所》、刘恒的《窝头会馆》等，相对而言，曹禺的追随者“寡”，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曹禺的剧作难以模仿之处，不仅仅在于高难度的戏剧技巧，更在于他的内心对民族文化的彻底反思，曹禺从意识思维上比较全面而自然地接受西方文化，并将西方价值体系融进了自己的剧作，这对于当代中国编剧来说，是很难达到的。 [图]